

【文稿】

論清末民初學界之「排荀」與「尊荀」

劉振琪*

一、前言

荀子在歷代學者的討論中，評價隨著各時期的不同主張而有高下之別，漢代，對荀子的人性論評價極高，劉歆、董仲舒欽佩其才能，認為是居於儒家承先啓後的地位。唐代，荀子的地位中落，韓愈評其「大醇而小疵」，並將其排拒在儒家道統之外，地位不如孟子。宋代，對荀子的評價最低，其性惡說及禮義的看法均受到宋儒的檢驗批評，其弟子李斯事秦之過，荀子亦受到牽連，而遭受與法家過從甚密的批評。清代，重實用及考證，使得荀子的評價翻轉，得到諸多學者的肯定，荀子的學說得到重新評估的機會¹。然而，清末仍有一股「排荀」風潮產生，代表人物以戊戌變法中維新派的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為主，在當時確曾引起矚目。同時，亦有「尊荀」的聲音出現，而以章太炎為代表人物。本文即欲探討在此時期的「排荀」與「尊荀」的主要論點，及其對荀子的批評或讚賞的背景因素，是否曲解或誤導的荀學原義，希冀釐清此時期的荀子評價問題。

二、「排荀」的代表人物及其論點

清末政治上的內憂外患及文化上西學的衝擊，使得儒學的發展，面臨極大的挑戰，太平天國之亂破壞了傳統的倫理綱常，西方的思潮與科學的進步，亦引發知識分子對於傳統思想的檢討聲浪，其激進者甚至將中國落後的原因，歸咎於傳統禮教的束縛，因而引發清末一直延續到民國的文化反省思潮。

身為戊戌變法思想領袖的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對於孔孟思想是採取支持的態度，康有為甚至有立孔教之舉，然而，對於荀子思想，三人砲口一致，同聲予以譴責，且其行文用語，有時極為嚴厲，彷彿荀子是集二千年所有之文化罪惡於一身，茲列舉其相關論述如下：

* 中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¹ 荀子歷代的評價問題可參閱鮑國順先生〈荀子評價的歷史觀察〉，收入氏著《儒學研究集》，高雄：復文出版社，2002年9月，頁105~134。

(一)康有為

康有為以公羊學派的三世之說為其政治理想的依據，所謂三世是「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以此涵蓋大同與小康之義。〈禮運〉篇所描繪的大同之境，天下為公，然現實中難以達成，反而多為小康之治。小康之治，優於亂世，天下為私，康有為在〈禮運注〉云：

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來先儒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所言不別其真偽精粗美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

康有為認為二千年來的政治均為小康之世，其欲建立孔子的大同世界，必須由小康漸進大同之治，其《大同書》充滿其理想的實踐，亦顯示其守舊的心態。對於中國不能進於大同的原因，是受到荀子的影響。

(二)譚嗣同

譚嗣同對於傳統思想抱持激烈的革命態度，對傳統禮教的「三綱五常」批判尤烈，受康有為影響，孔孟非其批評對象，荀子思想反而成為撻伐的對象，譚嗣同於《仁學》一書中提及：

孔之不幸，又不寧惟是。孔雖當據亂之世，而黜古學，改今制，託詞寄義於昇平、太平，未嘗不三致意焉。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既不足以盡孔教矣。況其學數傳而絕，乃並至粗極淺者，亦為荀學攙雜，而變本加厲，胥失其真乎。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詆君王，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荀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子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箝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為李斯，而其為禍亦暴著於世矣。然而其為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為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為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

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被託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²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亦汲汲然動矣。豈謂為荀學者，乃盡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跡，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為荀學而授君主以權，而愚黔首於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罪哉？³

譚嗣同對孔子學說多所讚揚，而將孔學不傳，禮教的缺失全歸咎於荀子身上，荀子彷彿成為千古罪人，必須擔負起所有二千年來的罪過。荀子學說中，「法後王」、「尊君統」、「喜言禮樂政刑」、「有治人，無治法」都成為箝制百姓生命思想的工具，其講「義」反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只因出了一個名為李斯的弟子，就要為弟子受過，將荀學與法家畫上等號，以致秦之暴政亦與荀學脫離不了關係，淪為「鄉愿」的譏評，地位之低落可見一般。至於言荀子有「冒孔之名，以敗孔子之道」，甚至「賣孔之罪」，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由此可凸顯在紛紛擾擾的清末，譚嗣同想要運用激烈的文詞以抗議傳統禮教對人們身心的桎梏，打破傳統的束縛，使得個人得到平等與自由。但是譚嗣同遵循康有為立孔教的思想，對其禮教的批判，似乎有牴觸之處，削減了批判的力道。

(三)梁啟超

戊戌變法時期的梁啟超，對荀子的評價一如康有為和譚嗣同，負面的批評居多，但其學術性質較為濃厚，不似前二者充滿個人主觀的想法，反而能以學術的立場來談論荀子思想。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五節有云：

啟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於是專以絀荀申孟為標幟。啟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其後啟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

²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6月，頁335~337。

³ 同註2，頁337~338。

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隻手，陽烏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⁴

此段文字引述者甚眾，對排荀一派當時批評荀學有一具體描述，甚至引用夏曾佑詩以凸顯維新派視荀學有如魔鬼一般。梁啟超採納清儒汪中的說法，認為自漢代以來所傳之經學，不論為今文家古文家均出於荀卿，提出荀學在學術思想史上居於傳經的地位。較諸康、譚二氏，梁啟超提供更多的證據以說明己見，如：

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子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者也。⁵

梁啟超首先對孟荀的不同，表達其看法，但未臧否是非，至於漢代經學全受荀學的影響，對荀子傳經的地位，梁氏有詳細的分析。然而，梁啟超不單以經學的傳承為主要論述，並就其閱讀荀子全書，提出他的四點意見：

⁴ 見《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頁138~139。

⁵ 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飲冰室文集》之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頁46~48。

由是觀之，則大同教派之大師，莊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師，荀子也。而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學，而大同之統殆絕之所由也。今先將荀子全書，提其綱領，凡有四大端：一尊君權，其徒李斯傳其宗旨，行之於秦，為定法制，自漢以後，君相因而損益之，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為荀子政治之派。二排異說，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專以攘斥異說為事，漢初傳經之儒，皆出荀子，故襲用其法，日以門戶水火為事。三謹禮儀，荀子之學不講大義，而惟以禮儀為重，束身寡過，拘牽小節，自宋以後，儒者皆蹈襲之。四重考據，荀子之學，專以名物制度訓詁為重，漢興，群經皆其所傳，斷斷考據，寢成馬融、鄭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為荀子學問之派。由是觀之，二千年政治，既皆出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實皆出於荀子，然則二千年來，只能謂為荀學世界，不能謂之為孔學世界也。⁶

梁啟超以「尊君權」、「排異說」、「謹禮儀」、「重考據」來評價荀子學說，以說明其缺失，不論政治與學術皆不能逃脫荀學的掌控，總結清末以來排荀運動中，較有系統的論說，也點出當時非議荀學思想的重點所在。

梁啟超對荀子的評價並非全然否定，他曾公開演講儒家哲學，對於人性善惡的問題、天命的問題、心性的問題，都給予荀子極高的評價，與孟子的地位相當。其〈讀書示例〉亦以《荀子》一書作為範例，示青年學子讀書之法。⁷梁啟超特別重視「荀子施學，全從經驗中來，故以人性為皆惡，此正與西洋之經驗哲學一派相近也。」可見對於荀學在教育、修養等方面的論點是予以肯定，甚至能觸及荀學具有西學精神的一面。可惜大家都著眼於他對荀學的抨擊而忽略其推崇荀學的論點。

三、尊荀的代表人物及其論點

⁶ 見〈論支那宗教改革〉，收入《飲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頁56~57。

⁷ 參看梁啟超講演，周傳儒筆記《儒家哲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

在一片「排荀」風潮中，只有章太炎站在「尊荀」的立場上為荀子的學說辯護。其於 1897 年發表〈後聖〉一文，開宗明義即云：

自仲尼而後，孰為後聖？曰：水精既絕，制作不紹，浸尋二百年，以踵相接者，惟荀卿足以稱是。非侈其傳經也，其微言通鬼神，彰明於人事，鍵牽六經，謨及後世，千年而不能闡明者，曰 正名、禮論。⁸

將荀子與孔子並稱為聖，章太炎並批評宋儒對荀子的評價：

夫治孟學以慕荀氏者，始宋程、蘇。蘇與程相敵述，其慕荀氏則合從，彼蘇氏尤昌狂妄言。推其用意，且曰死而操金椎以葬，下見荀卿，將敲其頭矣。利祿小生，不可與道古。其文學以程、蘇為寶祐，從而和之，使後聖之學，終於閉錮伏匿；仲尼之志，自是不得見。悲夫！並世之儒者，誦說六藝，不能相統一。章炳麟訂之曰：「同乎荀卿者與孔子同，異乎荀卿者與孔子異。」⁹

章太炎在其學術論文自選集的《馗書》初刻本，將〈尊荀〉列為首篇，可見其對抗康梁派之意圖。提高荀子的地位，與孔子相等，1902 年發表〈訂孔〉，將荀子抬高於孔子之上，雖在其後《馗書》重刻本及《檢論》中刪去〈尊荀〉，又將〈訂孔〉改寫，又把孔子置於孟荀之上，但是其尊荀已與孔子學說合述，不再特別彰顯其地位，這除了代表章太炎思想的變化，亦可說明其尊荀是有意與維新派抗衡，針對其排荀言論而發的。

除了外在環境的影響外，章太炎為什麼如此尊荀呢？廖名春云：

章太炎嚮往西學，當然不願成為主張「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孟子之徒。而荀子主張「博學」，主張「善假於物」，主張「法後王」，其思想對熱衷於西學的章太炎來說，無疑是一面抵禦傳統勢力壓迫的盾牌，無疑是對其行為的鼓舞，這樣，他也就當然甘心成為「荀子之徒」，走向尊荀之路。¹⁰

⁸ 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11 月，頁 37~39。

⁹ 同註 8。

¹⁰ 參見廖名春〈試論章太炎的尊荀〉，收入氏著《荀子新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2 月，頁 339。

章太炎自敘早年「所操儒術，以孫卿爲宗。」（《章太炎自編年譜》，1987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未改其尊荀的態度，而從荀子思想中找尋與西學契合之處。

四、「排荀」與「尊荀」之時代意義

歷來學者對於這兩派對荀學的不同態度，首先以經今文和古文學派之爭作爲討論的焦點，康梁的維新派是清末今文經學集大成者，認爲重考據的荀學，走的是漢代古文經學注重名物訓詁的路徑，自然極力批評荀學的不是，其排荀乃不遺餘力。而章太炎所受到的是古文經學的教育，是清末古文經學的代表人物，與今文學派自有極大的差異，彼此對孔子的態度不同，使得從東漢以來即有的經今古文之爭，延續到清末的荀子評價上，仍是爭論不休。

其次，兩派對於荀子思想的詮釋上，各有立場，排荀一派對荀子的尊君統、重禮儀、批評孟子最是無法忍受，否定荀子思想在其他方面的優點。尊荀一派則以其符合西學的創新精神，而給予高度讚揚。然而就上述人物對荀子思想的評價，章太炎的議論似乎未獲得太大的回響，康有爲、譚嗣同的意見被王國維批評爲充滿政治上的考量。¹¹唯有梁啓超的評論可引發學術討論的空間，張灝就針對梁氏對荀學的評價看出其背後隱含的歷史意義：

這種對荀子地位的尖銳指摘，不能像某些現代歷史學家認爲的那樣，只將它理解爲使維護文化認同的情感需要顯得合理的一種企圖。梁也參與了反對漢學一些重要思想傾向的行動，他相信這些重要的思想傾向全都可以追溯到荀子。與晚清「經世」傳統相一致，梁氏也反對漢學的考據學。漢學的考據學不正是表明了它與荀子唯智論思想之間的密切關係嗎？梁能忽視一位當代漢學大師俞樾是荀子思想的熱情提倡者這一事實嗎？梁將荀子看作是儒家思想近來令人極其痛心發展的根源，難道不是自然的嗎？固然，梁知道在19世紀末漢學的太平日子已經過去，但在學術界尤其在與學海堂

¹¹ 王國維著〈論近年之學術界〉，收入劉剛強編《王國維美論文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頁72~77。

有聯繫的廣州學者中，它的影響仍相當大。梁在跟康有為學習之前的三年裡一直是學海堂裡一位專一和優秀學生，他十分了解漢學的思想吸引力和它所包含的政治冷漠性。通過荀子這個代表人物，梁力圖站在經世的理想上否定儒學中所有的考據傾向。

張氏從梁啓超出身學海堂的背景，說明梁氏深知漢學中所包含的政治冷漠性，恰與其經世理想相反。而清代漢學又可溯源荀子，因此加以批評。其次，張氏又指明梁的批評尚有另一深意：

在荀子的思想裡，梁還看到了晚清另一強大思潮--宋代新儒學的淵源。也許這就是他為什麼首先將荀子而不是將更為世人所知的古文經學派視為敗壞儒家思想的主要起因的源由。因為今文經和古文經兩派間的所有爭議首先是關於漢學的性質問題，因此有爭議的主要是漢學的地位和性質問題。然而就梁來說，使經世理想變得模糊不清的不是漢學而是宋學。在這個問題上，荀子的作用在於他十分強調「禮」和儒家的權威主義的核心地位，梁將這一強調看成是他在正統宋代新儒家中發現的拘泥形式統一和過分關注修身的思想先導。¹²

梁啓超早期的荀學評論仍必須考慮到康有為的維新派的影響力，並看出宋代儒學的淵源，對於了解梁氏當時對荀學的批評頗有助益。

排荀一派對荀子思想的批評，有些是誤解荀學的觀點，茲分述如下：

(一)法後王：荀子認為先王的典範太遙遠，後人無法得知其詳情，後王的事蹟易得，故「法後王」，但其不反對「法先王」。

(二)尊君統：荀子仍是以民為本，必須尊君使君主有權利為百姓謀福利，非法家的重視君位。

(三)有治人，無治法：荀子認為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人而不是法，必須有好的統治者才能治理好國家，法的好壞取決於統治者的好壞，所以，縱使有良法仍必須靠人來實施。

(四)非孟：荀子批評孟子的性善說，並且認為他曲解孔子的思想原意，

¹² 張灝著，《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頁54~55。

說明真正的儒者要有益於國，改變儒者無用的觀念。

尊荀的章太炎反而提不出較具體的證據以闡發荀學思想，未提及荀子具有現代化的精神所在，反是排荀的梁啟超看到了荀學在某些觀念上具有現代化之意義，在蔣廣學的文章中引用了梁氏本人的看法：

梁啟超對管、荀等人從生存競爭的事實引出以法律（或禮）來實現社會正義的思想給予很高的評價。而荀子「由經濟的（生計的）現象進而說明法制的現象，尤為博深切明。謂離居不相待則窮，故經濟的社會，為社會之成始，謂群而無分則爭，故國家的社會，為社會之成終。其言爭之所由起，謂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欲者經濟學所謂欲望，欲多而物寡，即所謂欠乏之感覺，而欠乏之感覺，由於欲惡同物，人類欲望之目的物，如衣食住行等大略相同故也。荀子此論，實可為經濟學社會學國家學等之共同觀念也。」（《文集》之 15，第 47 頁）法律起源於人欲引起的物爭，其目的在於實現社會公正，荀子有關禮養人欲，給人求，當然是一種社會正義。¹³

將荀子群而無分、物欲的觀念與社會學、經濟學、國家學等結合論述，確實賦予荀學新的時代意義。

五、結語

介於清代重新恢復了荀學的地位，與民國之後受西學影響，更加彰顯荀學的時代意義，清末短暫的排荀與尊荀思潮，呈現當時學者在此環境思潮下對荀學思想的理解。排荀一派所提出的荀學種種缺失，有些非荀學本身的問題，而是以其預設之政治立場來立論，尤以康有為、譚嗣同為烈，至於梁啟超雖附和康、譚之說，但是對於荀學性善、天命、心性等問題亦持肯定態度。章太炎仰慕西學，能看出荀學的優點，雖未提出大量具體的尊荀論證，但對於民國以後，荀學的現代意義得以闡發，亦具先導之功。王國維〈論近年的學術界〉末段云：「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於

¹³ 蔣廣學著《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頁130~131。

其獨立而已。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爲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雖歷經二千年的紛紛擾擾，具有真知卓見的《荀子》在今日仍有其地位，應是具有學術上的價值，而非其他的考量。

參考書目

- 1.王國維著，〈論近年之學術界〉，見劉剛強編《王國維美論文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
- 2.梁啓超撰，《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
- 3.梁啓超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論支那宗教改革〉，見《飲冰室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
- 4.梁啓超講演，周傳儒筆記《儒家哲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
- 5.張灝著，《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
- 6.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
- 7.廖名春撰，〈試論章太炎的尊荀〉，見《荀子新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2月。
- 8.蔡尙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6月。
- 9.鮑國順撰，〈荀子評價的歷史觀察〉，見《儒學研究集》，高雄：復文出版社，2002年9月。
- 10.蔣廣學著《梁啓超和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